

今、古文经学之争与中国近现代文学变革

姜荣刚

摘要: 今文经学于晚清的再度勃兴,为其时“文学界革命”的发生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理论基础。为应对今文经学家的挑战,古文经学派也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文学变革思路,这不仅使中国近现代文学变革形成了双峰并峙的独特景观,也引起了时人对文学本质与文学变革的多元思考与实践。今、古文经学之争一直持续到“五四”新文学运动,由于受西学东渐的遮蔽,这一来自传统内部的重要动力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从而影响了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变革全面而深入的探索与思考。

关键词: 近现代; 今文经学; 古文经学; 文学观; 文学变革

作者简介: 姜荣刚,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近现代转型研究。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塘路2318号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311121。电子邮箱:jrg2222@126.com。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粹思潮与中国文学近现代转型研究”[项目编号:21BZW026]、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留学生文学群体文献辑考、整理与研究(1840—1927)”[项目编号:22&ZD269]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Debate between Modern-Text Confucianism and Ancient-Text Confucianism an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bstract: The revival of modern-text Confucianism laid a solid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scholars of modern-text Confucianism, scholars of ancient-text Confucianism also put forward a confrontational approach to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This not only created a unique landscape of two competing forces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but also provoked diverse thoughts and practices regarding the nature and revolution of literature among contemporary scholars. The debate between modern-text and ancient-text Confucianism continued until the May Fourth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eastward expansion of Western learning, this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rom within the tradition has long been overlook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which has affected the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study and reflection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modern times; modern-text Confucianism; ancient-text Confucianism; idea of literature; literary transformation

Author: Jiang Ronggang, Ph.D., is a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Literary and Art Criticism,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ddress: School of Humanit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2318 Yuhangtang Road, Hangzhou 311121, Zhejiang, China. Email: jrg2222@126.com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General Project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und (21BZW026) and the Major Project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und (22&ZD269).

传统士人的观念里,普遍存在“文学权舆,源于六经”(徐中玉 512)的固有认识,因此经学

的任何重大变化或阐释的根本性转变都必然会对文学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经学自秦厄后虽有

短暂之顿挫,至汉复又大盛,尤其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建议后,经学更是居于传统思想文化领域的支配性地位。不过,经学也由此出现了今、古文之分。西汉之世,今文率先立为官学,古文则因在野长期隐而不显,东汉伊始方为学者所重,并逐渐取今文而代之,今文由此消沉,直至晚清才再度勃兴,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学术思想的主流”地位(陈其泰²)。与以往不同的是,由于现实政治的需要,晚清今文经学甫兴即对古文经学展开了激烈批判,其代表人物康有为更是以考证的方式尽伪古文群经,企图一举而荡除之。这自然会引起古文经学家针锋相对的回应,二者的论争由此全面展开,并很快延及文学领域,从而对中国近现代的文学变革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受西学东渐这一主流时代因素的遮蔽,其未能得到学界特别的关注,中国近现代文学变革的复杂历程及其诸多关键性问题也因此无法得到有效揭示与合理解释,实为憾事。

一、今文经学的兴起与晚清“文学界革命”的发生

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中说“文学革命的目的是要用活的语言来创作新中国的新文学——来创作活的文学,人的文学。”(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¹)所谓“活的语言”就是“言文一致”的白话,这可以说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前提,也是其要达到的首要目标。因此这一点顺理成章地成为学界研判中国现代文学发端的标志之一,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认为现代文学源头可以“从戊戌变法向前推进十年,即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算起”(7),其首要依据便是黄遵宪1887年定稿的《日本国志》中所提出的“言文合一”观点。不过,黄氏虽然首次提出此种观点,但并未付诸实践,也没有得到时人的关注。直至甲午战争以后,启蒙救亡成为时代的主旋律,黄氏的观点才为人们所重视。最早利用此种观点的是梁启超,他在1896年发表的《沈氏音书序》中说“吾乡黄君公度之言曰: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中国文字,多有一字而兼数音,则审音也难;有一音而具数字,则择字也难。[……]华民识字之希,

毋亦以此乎。”(梁启超,《沈氏音书序》)梁氏的引文省略了黄氏前面一段话,其中说“余闻罗马古时,仅用拉丁语,各国以语言殊异,病其难用。自法国易以法音,英国易以英音,而英法诸国文学始盛。耶稣教之盛,亦在举《旧约》《新约》就各国文辞普译其书,故行之弥广。”(黄遵宪1420)这说的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它是欧洲“言文合一”或者说国语文学的开端。文艺复兴虽然在大约相同的时间里对中日文学的近代变革产生了重要的启示作用,但二者接纳它的思想文化资源却是截然不同的。日本学人借鉴文艺复兴除了启蒙的现实需要外,更主要的目的是废除汉语,以脱亚入欧。而中土维新人士借助的却是经学内部的文化资源,如梁氏在《沈氏音书序》的前述引文后又补充说“孔子在楚,翻十二经,《诗》《春秋》《论语》《孝经》,齐儒鲁儒,各以其音读之。亦如英法俄德,各以其土音翻切西经,又乌在其相离也。[……]中国文字,能达于上不能逮于下。盖文言相离之为害,起于秦汉以后,去古愈久,相离愈远,学文愈难,非自古而即然也。”(梁启超,《沈氏音书序》)如此比附不难理解,作为早期的文学变革,如果没有来自经学内部资源的有力支撑,是很难获得士大夫阶层普遍认同的。当然,此种比附并非梁氏个人一己之发明,而是自龚自珍以来今文经学家的一贯做法。

晚清的今文经学兴起于常州,但产生重大影响则始于龚自珍。梁氏曾说“光绪间所谓新学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14)龚氏在《总论汉代今文古文名实》一文中称“今文、古文同出孔子之手”,“未读之先,皆古文矣,既读之后,皆今文矣”,“此如后世翻译”,“未译之先,皆彼方语矣,既译之后,皆此方语矣”(龚自珍75)。龚氏此种观点虽如有学者所说受到了其时西学翻译的启示,但也不能因此忽略了传统学术资源自身的潜在作用。所以龚氏在该文末尾又补充称“若夫读之之义有四,不专指以此校彼而言,又非谓以博士本读壁中本而言,具如予外王父段先生言(详见段氏《古文尚书撰异》)。”(76)龚氏此处虽未明言段玉裁如何启导了他的此种观点,但此后同为今文学家的皮锡瑞却一语道破了个中联系,他说“段氏解‘读’字甚精,龚氏通翻译,解‘读’字尤确。”(71)“读”

字,许慎《说文解字》仅简单释为“诵书也”(许慎,《说文解字》51),段氏则注称“抽绎其义蕴至于无穷,是之谓读”(许慎,《说文解字注》90),这一发挥的确使“读”字的含义与翻译十分接近。也正因此,龚氏的此种观点得到了此后今文经学家的普遍认同。其中重要的人物廖平,在其早期的《今古学考》中就提出“石经以前,经多译改,今、古之分,不在异文”(廖平,第1册78—79)的观点,此后的《知圣篇》更是明言“文字今、古,有埃及、希腊之分。孔子翻经,正如西人用埃及古文说八大帝事,实以古言译古书,所以谓之‘雅言’,通古今语。”(350)

众所周知,晚清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是康有为,他的学术思想在向今文经学的转变过程中受到了廖平的极大影响,其名著《新学伪经考》甚至一度被认为剽窃了廖氏的观点,是迄今为止仍聚讼不已的一大学术公案。毫无疑问,该著也沿袭了廖氏的上述观点,其中说“《公》、《穀》二传,鲁、齐、韩三家《诗》,文字互异,良由口说之故。且古人字仅三千,理难足用,必资通假,重义理而不重文字,多假同音为之,与今泰西文字相近。譬由翻译,但取得音,不能定字。”(康有为,第1集369)1890年梁启超入京会试失利,经学海堂同学陈千秋得识康有为,“一见大服”(丁文江23),遂拜其为师,在长兴里学堂问学期间,与陈千秋一起协助康有为完成了《新学伪经考》的写作。经过这一学习过程,梁氏自称“尽弃其学而学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18),可以说完全接受了康氏的今文学说。很显然,前引梁氏《沈氏音书序》中的观点无疑就是他此一时期所学的牛刀小试。

近代今、古文经学家的文学观均导源于孔门四科中的“言语”与“文学”,但因学术立场之不同,对二者的接受存在着明显的分殊与偏倚。今文经学因师徒口说授受,诚如康有为所言“重义理而不重文字”,这就使其更倾向于以“言语”论文学,从而不薄今语乃至方言与俗语,并由此认为六经及其衍生的解经作品与先秦诸子文学皆为言文一致之作。如廖平所说“自孔经革更野史,译从雅言,凡世俗习惯之文字,一扫而空。[……]然文字新创,而名物名辞,仍采各国方音土语[……]是孔经当日,仍然言文一致,并不求诸高深。”(廖平,第2册925—926)既然“言语文章无别”(康有为,第2集194),那么“言语”的文学性自然就

得了空前的提升,如康有为《论语注》中说“德行、政事、文学,后人皆知重之,至言语立科,则后世不知。岂知言语之动人最深,盖春秋战国尚游说辨才,孔门立此科,俾人习演说也。观董子词辩而《公羊》立,江公口讷而《穀梁》败,即论经学,亦重语言矣。”(康有为,第6集464)在此前撰著的《日本书目志》“修辞演说”一类书目的小序里,康氏也说了大体类似的话,并将“春秋时会盟聘问,战国时飞辨骋辞”与“泰西公议传教,犹尚演说之风”(康有为,第3集461)同等看待,泰西的演说是以今语出之的,在时人眼中是典型的俗语文学,这种比附足见今文学经学与俗语文学之间具有极深的内在学术关联。

由此可见,在梁启超倡导“文学界革命”之前,今文经学的兴起已为其做好了充分的理论准备,从而直接启导了他的文学变革实践。从言文一致的角度出发,他推导出了“诗文界革命”的逻辑理路,如他在《新民说》中所言“社会之变迁日繁,其新现象、新名词必日出[……]言文合,则言增而文与之俱增,一新名物、新意境出,而即有一新文字以应之,新新相引,而日进焉。言文分,则言日增而文不增[……]故虽有方新之机,亦不得不窒。”(梁启超,第2集578)由此,梁氏提出其“诗文界革命”的创作纲领“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任公,《汗漫录》4)传统诗文创作对时下新语与俗语是持排斥态度的,所谓“出辞气斯远鄙倍”是也,然而不能容纳新语与俗语,又岂能达到开启民智的目的?毫无疑问,今文经学的兴起为梁氏解决了这个根本性难题,使新语与俗语入文有了来自经学内部资源的强力支撑。另外,今文经学重“言语”的观点,也使梁氏找到了提倡通俗文学的有力依据。在其发动“小说界革命”的宣言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氏讲了小说具有支配人道的四种力,并称“此力之为用也,文字不如语言,然语言力所被不能广不能久也,于是不得不乞灵于文字。在文字中,则文言不如其俗语,庄论不如其寓言,故具此力最大者,非小说末由”(饮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4—5)。此段话表面看与明代以来倡导通俗文学的传统论调没什么两样,内里的理论根据却全然不同,关于这一点,梁氏在此后的《小说丛话》中说得十分清楚,他说:“中国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语。观《公羊传》《楚

辞》《墨子》《庄子》,其间各国方言错出者不少,可为左证。故先秦文界之光明,数千年称最焉。”(饮冰,《小说丛话》2)该文前半部分与此前发表的《沈氏音书序》完全一致,后一段话又称“本朝以来,考据学盛,俗语文体,生一顿挫”,显然是针对古文经学派有为而发,因为今文经学“重义理而不重文字”,考据自然非其所长,更不屑为。

梁启超倡导的“文学界革命”很快获得了智识阶层的普遍响应,这除了现实政治的强力助推外,今文经学的适时兴起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毕竟在西学尚未受到士大夫阶层普遍认同的情况下,来自经学内部的理论支撑无疑更为有力。所以继梁氏而起的裘廷梁,其《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先后被《苏报》与《清议报》转载,对此后的白话文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至被学界视为“清末白话文运动的指导纲领”(付建舟 胡全章 6),而思路也与梁氏一般无二,其中称“文字之始,白话而已矣”,并认为有三个证据可以支撑这一观点,前两个证据均是对上古情况的逻辑推演,而第三个证据即是孔子以“土话译经”,至汉时山东诸大师“犹各以方音读之,转相授受”,而“后人不明斯义,必取古人言语与今人不相肖者而摹仿之,于是文与言判然为二,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实为二千年来文字一大厄”(裘廷梁 1—2)。

综上所述,今文经学的文学观点与西方文学颇多相似之处,因此早期维新人士在利用此一资源进行文学变革时,往往与西学混同使用,加之随着戊戌变法与庚子事变的相继发生,中土士人对西学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引西学以为文学变革依据的趋向愈发明显,来自经学内部的资源反因此遭到了遮蔽,以致令人觉得晚清“文学界革命”的动力更多地来源于西学,与传统资源的关联性不大。这种观点无异于买其椽而还其珠,实际上今文经学的影响不仅没有因此遭到丝毫削弱,而且一直在发挥着潜在的重要作用,直到“五四”时期,具有今文经学背景的钱玄同等人仍然以之作为发动文学革命的有力武器(详见后文分析),便是显著的例证。

二、《文学说例》:章太炎对今文经学的回应及其文学思想的初步建构

晚清古文经学的代表人物是章太炎,而他对

今文经学的攻击也最力。1899年他就撰成《今古文辨义》一文,对今文经学进行了全面批判,尤着力于廖平学说的批评,在此后致刘师培的信中更是称其“耳食欧书,惊其瑰特,则又旁传邹氏,通其说于赤县神州,至谓‘雅言即翻译,翻译即改制’。荒谬诬妄,更仆难终”(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书信集》135—136)。这封信不仅反映出了章氏坚定的反今文经学立场,同时对由其所形成的文学观及其创作也持否定态度。事实上,在章氏的眼中,今文经学派不乐训诂考据,缘经放论,本就与文士无二,如其《馥书·清儒》篇中所言:“文士既已熙荡自喜,又耻不习经典,于是有常州今文之学,务为瑰意眇辞,以便文士。”(章太炎,《章太炎全集·〈馥书〉初刻本、〈馥书〉重订本、检论》156)所以他此后的文学观念重构及其革新思路,往往是针对今文经学的观点有为而发,如若此点不明,则其很多观点便难以得到有效的揭示与阐发。

1902年,章太炎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文学说例》,该文前附小序称“叙曰:《尔雅》以观于古,无取小辩,谓之文学。文学之始,盖权舆于言语,自书契既作,递有接构,则二者殊流,尚矣。”(章氏学,《文学说例》《新民丛报》第5号75)章氏写作《文学说例》时,学术上已与康有为决裂,但因政治上还和康氏站在一起,所以对今文经学的批评“矛头往往指向廖平”,然而含沙射影地驳斥康氏,也同样十分明显(彭春凌 124)。如前所述,康氏基于今文学经学立场,提倡文学崇尚“言语”,而章氏此处则标举与之殊流的“文学”,其指向性可谓不言而喻。这一点在章氏此后的《馥书·清儒》篇中有更为明显的体现,《馥书·清儒》篇与《文学说例》在观念思路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后者关于姚鼐拜戴震为师遭谢斥的事,在《馥书·清儒》篇中也同样存在,并说由此“天下视文士渐轻。文士与经儒始交恶。[……]夫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优衍;其分途自然也”,接着便批评今文经学“不习经典”,“务为瑰意眇辞”(章太炎,《章太炎全集·〈馥书〉初刻本、〈馥书〉重订本、检论》156),徒便文士而已。而《文学说例》亦云“自袁宋至今,散行噂沓,俚辞混淆,苍雅之学,于兹歇绝。而诤诞自壮者,反以破碎讥往儒。六百年中,人尽盲瞽,哀哉。戴先生起自休宁,王、段二师,实承其学。综

会雅言,皆众理解,则高邮尤懿矣。不及百年,策士群起,以袁宋论锋为师法,而诸师复受破碎之诮。顾彼所谓完具者安在耶?”(章氏学,《文学说例》《新民丛报》第5号79)此言前半段批评的是宋学,后半段批评的是今文经学,包括与之相应的文学风尚。

明晰了《文学说例》的写作背景及其目的,其理论建构的逻辑理路就有迹可循了。首先需要弄清的是其中的“文学”概念,《大戴礼记·小辨》篇虽然有“尔雅以观于古,无取小辨”,却无“谓之文学”一句,也就是说该篇不是章氏“文学”概念的直接来源。不过,《文学说例》文本内部已为此提供了解读的线索,其中说“言语、文学,厥科本异”(章氏学,《文学说例》《新民丛报》第15号50),可见章氏采用的仍是孔门四科的传统概念。这说明章氏此时尚未有重构一个新的文学观念体系的想法,不过是想借此排击今文经学及其文学风尚罢了。通过前文论述可知,今文经学“重义理而不重文字”,所以文学观念自然倾向于孔门的“言语”一科,以为此为文学所权舆,如康有为《长兴学记》中所说“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故四科之列,文与学并。战国以降,辨说蜂起;西京而后,文体浩繁;世既竞尚,不能不通。”(康有为,第1集345)将“文”与“言语”科对应,“学”与“文学”科对应,确实符合《论语》孔门四科的本义,但是概念都是不断发展演变的,不可能一成不变,不过这并不妨碍今文经学派从“言语”一科理解文学的固有思路,所以对早期行人与策士的游说辩说及时下的演说报章文体均持欣赏态度。章氏《文学说例》探讨的重心由“言语”科转向“文学”科,自然就否定了今文经学派文学观的合理性,其中说“据实而书,不更润色者,则曰口说;铨裁删刊,缘质构成者,则曰文辞。[……]由魏逮唐,分异文笔。余以文既异笔,而口说复与文笔大殊。策士飞箝之辩,宜与宋儒语录,近人演说,同编一秩[帙],见其与文学殊途,而工拙亦异趣也。效战国之口说以为文辞者,语必佻俗,且私徇笔端,苟炫文采,浮言妨要,其伤实多”(章氏学,《文学说例》《新民丛报》第15号50—51),可以说完全将口说排除在了“文学”之外。正是以孔门四科的“文学”概念为依据,章氏借用王充《论衡·超奇》篇的观点,认为文学的最高境界是鸿儒,若刘向、刘歆,“本好博览,左右采获”(章太炎,《章

太炎全集·书信集》130),自然在此之列,刘歆一向被今文经学派视为伪撰古文经的罪魁祸首,而章氏却将其视作文学最高境界的代表,其针对今文经学派的文学立场可谓十分明显。

今文经学“重义理而不重文字”,自然倾向于认为文学权舆于孔门四科中的“言语”,对于经学的传授而言可以不借助于文字,但文学毕竟还是要落实到文字上的,对此他们并未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思考与建构,这自然就给古文经学派留下了可乘之机。《文学说例》从文字入手重新讨论文学的本质性问题,确是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与关键。该文开首即云“六书初创,形声事意,皆以组成本义,而言语、笔札之用,则假借为多”,又借用域外学者的观点称“言语本不能与外物吻合,则必不得有所表象”。这样,文字就不能完全尽其本义,自然会出现“治小学与为文辞者所由忿争互诟,而文学之事日益纷纭”的局面。由此,章氏认为“言语不能无病,然则文辞愈工者,病亦愈剧,是其分际,则在文言质言而已。文辞虽以存质为本干,然业曰文矣,其不能一从质言可知也。文益离质,则表象益多,而病亦益甚。”“质言”是未经人为修饰的俗语或方言,“文言”即雅言,后者显然较前者表象更多,但既已称“文”,就只能从“文言”而非“质言”,如果再求文辞之工,必然导致“文益离质,则表象益多,而病亦益甚”。所以章氏开出的药方是“斫雕为朴,亦尚故训求是之文而已”(章太炎,《文学说例》《新民丛报》第5号76—78),这就重新回到了古文经学的朴学立场。当然,这一观点看似有极端复古的倾向,实际上别有用心,汉字造字的方法有多种,章氏主要探讨此一种方法,乃是针对梁启超等新派人士倡言言文一致的文学革新思想有为而发,由于内容涉及较多,留待下文再论,此不赘述。解决了文辞的产生问题,章氏又借助于涩江保《希腊罗马文学史》的观点,对先秦时期的文学流变作了简单的描述,称禹域与希腊一样,是“韵文完具而后有散文”,“由魏逮唐”,又“分异文笔”(章氏学,《文学说例》《新民丛报》第15号49—51),这些看法基本沿袭了传统。

应该说,《文学说例》有相当多的内容沿袭了章氏前期文例探索的相关成果,或是对其的进一步深化,所以在此后《馥书》的重订本中,该文又几乎全部被融进了《订文》的附录《正名杂义》中。

不过即便如此,《文学说例》仍有其重要的理论发展,那就是针对今文经学及其文学风尚,对文学的本质及其发生问题进行了新的理论思考,尽管其观点多未超出传统的范围,但对近代文学观念体系与文学革新思想的重构与转变来讲,仍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三、刘师培、章太炎的文学观重构及其文学革新思想与影响

章太炎的《文学说例》发表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对于其倾向与目的,梁氏不可能不清楚,但却未引起他的丝毫反应。当然不回应并不代表着认同,而是考据非其所长,因此无力或不屑回应,正如他《上康有为书》中所说“考据家旧习,吾党正排斥不遗余力,必不宜复蹈之。[……]其人如信吾言也,即无此考据,犹之信也,其不信也,有此考据,只益增攻诘耳。”(梁启超,第19集 173)

首先回应章氏观点的是他引以为经学同道的刘师培,此即刘氏在《国粹学报》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源始》。该文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驳斥今文经学的文学观,二是修正章太炎文学观的偏颇。对于前者,刘氏虽然指出“欲溯文章之缘起,先穷造字之源流。上古之时,有语言而无文字”,但又称自文字出现以后,上古便有了“言与字分,以字为文”的观念。这就将“言语”排除在了“文”之外,不过“文”毕竟是在“言语”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刘氏又称“言语”有“文言”“质言”的区分,“言之质者纯乎方言者也,言之文者纯乎雅言者也”。“雅言犹今官话”,这是“文言”的基础,刘氏认为能称为“语言中之文”的是便于记诵的“偶文韵语”。刘氏从有无修词的角度对“言语”进行区分,目的是要将二者形成文字后的书写区分开来。他认为前者的演化系统为:先秦的经、汉代的赋颂箴铭、六朝的“文”、唐宋以后之骈文;后者的演化系统为:史、先秦诸子、汉代的论辩书疏、六朝的“笔”、唐宋以后之古文。(刘光汉,《文章源始》1—5)这种区分当否可置勿论,其目的可谓十分明显,那就是破除今文经学以“言语”为“文章”的观点,认为其所谓“言语”实仅为“语”,形成文字后即是与“文”有别的“笔”。这不仅弥补了章太炎批驳今文经学文学观所遗留的逻辑漏洞,同时

也借此修正了章氏以文字为文的观点,从而确立了骈文的文学正宗地位。

对于刘师培的观点,章太炎后撰《文学论略》,对其作了回应,也顺带批评了时已为日本广为接受的西方纯文学观。该文虽然沿袭了《文学说例》的观点与思路,但由于需要面对新的理论问题,因此思考更为全面,探讨也更加深入。该文首先给“文学”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或谓文章当作彰彰,此说未是。要之,命其形质,则谓之文,状其华美,则谓之彰。凡彰者,必皆成文,而成文者,不必皆彰。是故研论文学,当以文字为主,不当以彰彰为主。”(章绛,《文学论略》《国粹学报》第2年第9号 4)由于受刘氏影响,章氏将“文(章)”与“文学”作了区分对待,前者虽有“文章”与“彰彰”的分别,但其意类似于今天所说的文学概念,而“文学”诚如贺昌盛所言,乃“研究‘文’的形制原则的‘学问’”(107)仍属传统“文学”之学说的意涵范畴。“文章”与“文学”在中国古代都可作为文学的概念来使用,相对而言,“文章”与“文”更接近,因此刘氏以“文章”代替“文学”在概念使用上无疑更符合传统文学观念认知,这大概是章氏进行概念使用调整的主要原因。接着章氏仍借王充的《论衡·超奇》篇理论进行分析,说明其时“文之与笔,本末分途,而所谓文者,皆以善作奏记为主”,历史、经说、诸子亦“非如后人摈此于文学之外”。至于晋以后,文、笔虽分,但“只存时论,固未尝以此为限界”,昭明序《文选》之说也难以成立,阮元文、辞之分的说法,更是“矛盾自陷”,不足为据。同时,章氏还对时下的文学观进行了批评,称“或言学说、文辞所以异者,学说在开人之思想,文辞在动人之感情,虽亦互有出入,而大致不能逾此,此亦一偏之见”(章绛,《文学论略》《国粹学报》第2年第9号 4—6)。总之,“前之昭明,后之阮氏,持论偏颇,诚不足辩。最后一说,以学说与文辞对立,其规摹虽稍宽博,而其失也在惟以彰彰为文,而不以文字为文,故学说之不彰者,则悍然摈之于文辞之外”,《论衡》之说“虽较诸家为胜,亦但知有句读文,而不知无句读文,此则不明文学之原矣”(章绛,《文学论略》《国粹学报》第2年第10号 1)。

《文学论略》虽仍以文字作为文学的本原,但与此前的《文学说例》相比,又提出了有句读文、

无句读文这对概念。有句读文指以文字书写者,无句读文即“表谱图画”等。这样,文字的产生,“本以代言,而其用则有独至。凡无句读之文,皆文字所专属者也。文之代言者,必有兴会神味,文之不代言者,则不必有兴会神味。不代言者,文字所擅场也,故论文学者,不得以感情为主”(章绛,《文学论略》《国粹学报》第2年第10号2)。章氏写作该文时,中土有三种比较流行的文学观念:一是与桐城派关系密切的今文经学的文学观,二是由西方输入的纯文学观,三是以骈文为正宗的文学观。三者观点虽然差异甚巨,但均有以“感情为主”的倾向。由此可见,章氏该文虽是对刘氏的直接回应,却有着整体的理论思考。章氏认为如此区分,“而后文学之归趣可得言矣”,“无句读者,纯得文称,文字之不共性也,有句读者,文而兼得辞称,文字、语言之共性也,论文学者,虽多就共性言,而必以不共性为其素质”。这无疑是将此前以文字为文学根本的观点推向了极致,对以语言为中心的文学观排斥更力,可见其主要针对的仍是今文经学,而非其经学同道刘氏。这样,有句读文中最接近无句读文的自然就是典章学说及与之接近的疏证类,由于其“文皆质实,而远浮华,辞尚直截,而无蕴藉”,乃文之最善者。这与《文学说例》一样,都是基于古文经学立场的文学观。当然,章氏虽然如此言说,并非完全排斥其他文体,他认为“一切文辞,体裁各异,故其工拙亦因之各异”,但“解文者,以典章学说之法,施之历史公牒,复以施之杂文,此所以安置妥帖也;不解文者,以小说之法,施之杂文,复以施之历史公牒,此所以馥馥不安也”,“工拙者系乎才调”,而后者关乎雅俗,“雅俗者存乎轨则,轨则之不知,虽有才调而无足贵”(章绛,《文学论略》《国粹学报》第2年第11号1—2)。这样,他将“文学”重新定义为“论文的法式”——文章的体式,也就不值得奇怪了。不过,该文虽然与《文学说例》观点一致,但前者的西方化影响或被完全去除,或仅仅作批判的对象而存在。

刘氏并未因为章氏的回应观点有丝毫改变,之后又相继发表了《文笔词笔诗笔考》《广阮氏文言说》等文章,以考证的方式力证“文章之必以彰彰为主”(刘师培,《广阮氏文言说》1)。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从根本上讲,是文、质的统一体,章、刘二人可以说是各得一偏,无法说服对方自是事

至必然,其观点也由此被时人视为传统文学广、狭义的代表。

尽管章、刘二人在文学观念体系的建构上有着显著的差异,但是他们在文学革新的思路却有着相当一致的取向。对于以通俗文学进行启蒙教育,他们均表赞同,如邹容“草《革命军》以宾满洲,自念语过浅露”,就章氏求修饰,章即曰“感恒民当如是”(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222),刘氏亦称“以通俗之文,推行书报,凡世之稍识字者,皆可家置一编,以助觉民之用”(刘光汉,《论文杂记》6)。不过他们提倡通俗文学与今文经学派还是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廖平、康有为虽也坚持“辞远鄙倍”的古训,但经他们观点衍生的梁启超“文学界革命”,实际已冲破了这条铁律,使文言文的大厦有倾颓的危险。正是有鉴于此,章、刘二人提出了他们的应对策略,此即章氏倡导的“一返方言”的文学革新思路。在近代,言文学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言文不能合一,如梁启超所说:“衍形而兼衍声者,以形为主,形之为物固定,衍之不能自由,既不离形以衍声,则声并为形所束缚,而不得自由以为衍,文字遂成为固体。洎社会之新事物、新思想发生,旧有之文,不足于用,而无术以补之,惟乞灵于转注、假借之二例。”(梁启超,《国语文原解》5—6)章氏在《文学说例》中探讨的结果也是如此,但在文学的革新思路却与梁氏等新派人士不同。既然言文分离的原因是假借,那么使用本字不就解决问题了吗?由此章氏提出了“一返方言”的主张,他认为:

中国所以便俗致用者,其字虽稀,然方言处处不同,俗儒鄙夫,不知小学,咸谓方言有音而无正字,乃取同音之字用相摄代。[……]若综其实,则今之里语,合于《说文》《三仓》《尔雅》《方言》者正多。[……]俗士有恒言,以“言文一致”为准,所定文法,率近小说、演义之流。其或纯为白话,而以蕴藉温厚之词间之,所用成语,徒唐、宋文人所造,何若一返方言,本无言文歧异之征,而又深契古义。(太炎,《汉字统一会之荒陋》104—105)

为实现这一目标,章氏特著《新方言》一书,刘师

培与章氏弟子黄侃亦参与襄助,黄氏序称“已陈之语,绝而复苏;难谕之词,视而可识。[……]言文一致之真,庶几可睹。”(150—151)

由此可见,与梁启超倡导的“文学界革命”相比,章太炎虽然也以“言文一致”作为文学革新的目标,但实现路径却完全不同,或者说根本上就是南辕北辙。写作力求使用本字,文章自然古奥难懂,鲁迅事后就说,“白话是写给现代的人们看,并非写给商周秦汉的鬼看的”,这种“言文一致”显然是“文不对题的”(鲁迅 第6卷 373)。不过即便如此,章氏的文学革新思想及其文风在当时仍产生了极大影响,周作人便说他“文章虽是古奥,未能通俗”,“但在东京及中国内地的学生中间力量也不小”(钟叔河 527)。鲁迅尽管如此言说,当时却也是此种文体的崇拜与模仿者。

四、今、古文经学之争的余绪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正如前文所述,对于章、刘等古文经学家的猛烈攻击,今文经学家尤其是康、梁二人未能作出有力的回应,加上晚清后期国粹思潮的逐渐兴起,章、刘二人的文学主张因此得到了时人的广泛响应,从而与梁氏倡导的“文学界革命”形成了双峰并峙的独特景观。

当然,章、刘二人对今文经学派尤其是梁氏文学革新思想的排击,虽未得到后者的回应,却引起了时人对文学本质问题的深入思考与探讨。在章氏《文学论略》发表后,严复即翻译了英国学者倭斯弗(W. Basil Worsfold, 1858—1939年)《美术通论》(*Judgment in Literature*)中的前三章内容《艺术》(*Art*)、《文辞》(*Literature*)与《古代鉴别》(*The Criticism of the Ancient World*)。《艺术》是总论。《文辞》探讨的是语言文字的问题,不过与前文所述今、古文经学的思路不同,该文直接指出“文辞者,所以写人心所受于物之感情与其心所即物而得之思理也,其所写者,概古今人事之变端,统幽明物界之现象”(倭斯弗,《美术通论·文辞》4)。《古代鉴别》则通过文辞演进史的分析认为“以文质之可分,而创意之文与实录之文区为二类,而所以介绍心灵于万物者,其用固不可偏废也。”这一点与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颇为接近,因此严复在按语中称“文字分为创意、实录二种,中国亦

然”,并说“于其前者谓之学人,于其后者谓之文人,而二者皆知言之选也。前以思理胜,后以感情胜”(倭斯弗,《美术通论·古代鉴别》2—3)。严复翻译《美术通论》的现实目的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对梁启超与章太炎两种各取一偏的文学革新思路均有所不满,认为应该根据实录与创意之文各自的特点予以施教,不能混而不分,或趋于一偏之极端。严复的此种文学革新取向直接启导了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周氏兄弟,周氏兄弟此时虽从章氏问学,但对其文学观却难以认同。许寿裳就回忆称鲁迅认为章氏“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25),混淆了文字与文学之间的分别。严译《美术通论》的发表,无疑给了周氏兄弟表达自己观点的勇气,他们先后在刘师培编辑的《河南》杂志上刊载了《摩罗诗力说》《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近时论文之失》等文章,这些文章虽然认同《美术通论》对艺术的本质性规定——“托意写诚”^①(the presentation of the real in its mental aspect)(Worsfold 5),但更倾向于纯文学,以为“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令飞,《摩罗诗力说》80)。严复与周氏兄弟的文学主张在梁启超与章太炎文学革新正轰轰烈烈展开的时候提出,自然难以得到时人特别的关注,直到“五四”时期才为人们所重新“发现”,并为其超前意识所惊服。然而回到历史语境,不难发现他们的这些所谓超前意识实际上都不是无因而生的,而是与其时的今、古文经学之争存在着内在的学术关联。

梁启超与章太炎文学革新的双峰并峙虽然没有因为严复、周氏兄弟等人的反对声音而受到丝毫的撼动,但随着袁世凯称帝与张勋复辟等一系列事件的刺激,被古文经学压抑的今文经学又重新焕发光彩,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从而打破了近代文学变革的平衡局面。更具吊诡意味的是,新文学阵营中态度最为激进且高举今文经学大旗的钱玄同、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始初均是古文经学的坚定支持者。钱玄同在日本留学期间,因问学章氏而服膺师教,“拳拳弗敢失坠”(钱玄同 第4卷 86),但在1911年读到康氏《新学伪经考》与崔适《史记探源》后,遂

“‘背师’而宗今文家言”(225)。顾颉刚始初亦受学章氏,“愿意在经学上做一个古文家”(顾颉刚,第1卷22),竟然与钱氏一样,在读到《新学伪经考》后发生了学术思想上的古、今转向。傅斯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本是“中国文学系”黄侃的高足,被顾颉刚引到胡适的哲学史课堂,受其影响,亦脱离古文经学阵营,走上了“从今文非古文”(傅斯年324)的道路。不过,钱氏等人虽然在学术思想上发生了古、今的转向,但并非如此前的康有为等人那样“将古文经根本推翻”,“一宗今文学说”,而是“用了今文家的话来看古文家,用了古文家的话来看今文家”(顾颉刚,第1卷89),其目的在于弄清经学的本来面目。所以钱氏等人从今文经学那里吸取的与其说是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怀疑精神,钱氏自己就称一百年来“今文学运动”的成绩有两方面“一是思想的解放,一是伪经和伪史料的推翻。”(钱玄同,第4卷297)这与梁启超对《新学伪经考》的意义判断如出一辙,他说该书“所生影响有二: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摇动;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18)。

正是因为具有今文经学的怀疑精神,钱玄同、顾颉刚、傅斯年三人遂成为胡适“整理国故”思想的忠实拥护者与坚定实践者。所谓“整理国故”就是对学术思想的重新评估,如胡适所说,“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胡适,第1卷699)。清代以来,无论是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虽如傅斯年所说“有益于学问界者甚大”,但形式上仍以复古的面貌出现,其影响下的文学革新自然也不能不受此种风气的熏染。古文经学固不必说,即使是梁启超基于今文经学的“文学界革命”,也有其明显的不彻底性,他对文学“传世”与“觉世”(梁启超,第1集297)的划分即是显著的例证。所以,胡适批评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胡适,《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149),语言虽不无过甚之处,但也大体指出了梁氏文学革新问题的关键所在。而经过“整理国故”的史学还原与价值重估,经学的神圣光环自然会被打破。如顾颉刚的《诗经的厄运与幸运》,就力图“把战国以

来对于《诗经》的乱说都肃清”,还其以本来面目——即“《诗经》是一部文学书”(顾颉刚,《诗经的厄运与幸运》1)。钱玄同更彻底,他自称经学是其拿手戏,十三经在他看来,“不过是不伦不类,杂七杂八的十三部古书而已”(疑古玄同,《废话》132)。打破了经学的神圣光环,文学复古自然也就失去了依托。这种做法正如闻一多所说,是“里应外合”,更能促进新文学运动的顺利展开。所以钱氏等人虽然肯定梁氏在晚清的文学革新,但也批评了他的不彻底,称其文章“未能尽脱帖括蹊径”(钱玄同,《致陈独秀》6)。由此可见,“五四”新文学阵营虽然与梁氏倡导“文学界革命”一样,都有引今文经学作为文学革新思想资源的做法,但态度却有本质之不同,前者根本不承认经学的所谓神圣性,所以也就没有复古的必要,而经学的文学本真面目的还原——如《诗经》被认为主要由民间歌谣构成,^②不仅为白话文学提供了历史依据,当然更重要的是,它也如傅斯年所说,“可为未来之新思想作之前驱(今文学派)”(327),从而彻底冲破了传统文学循环论的窠臼,真正走上了文学革命的道路。

正如梁启超在晚清倡导“文学界革命”遭到古文经学家的集体讨伐一样,“五四”新文学运动也导演了同样的一出。顾颉刚就说傅斯年被引进胡适的路子上去后,“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而“中国文学系的一班老同学,如薛祥绥、张煊、罗常培等则办起《国故》来,提倡‘保存国粹’,并推刘师培作社长,坚决地和《新潮》唱对台戏”(顾颉刚,第1卷151)。后者实际还有章氏的高足黄侃,阵容与晚清堪称匹敌,但影响与晚清无法相提并论,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当然,“五四”新文学阵营的经学思想虽然已破除了门户之见,但影响并未真正消除,所以他们的和古文经学的论争仍时断时续地进行着,没有彻底停息。真正终结这场论争的是钱穆,他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使今、古文经学之争完全演化成了一个史学问题(张凯265)。失去了经学的依托,此后研究经学典籍的史家,也就没有了缘经议政或讽世的冲动,经学直接影响现实文学的传统至此中断。比较典型的是结束今古文经学之争的钱穆,其《刘向歆父子年谱》虽辩驳了刘歆造伪一说,抽去了今文经学攻击古文经学的根基,文学立

场也趋向于旧文学,但“仅自怡悦,闭户自珍,未能有所树立,有所表达,以与世相抗衡”(1)。钱穆不与新文学相抗衡固然与其个性存在密切关系,但他将经学作为史学来研究,自然不会有以往经学家借经议政或讽世的冲动,所以这恐怕才是更为关键的原因。

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变革,以往研究多偏重于西学影响的探索,这一研究范式当然有其充足的理据,但是通过本文的论述可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也极其重要,只是由于受西学东渐这一主流时代因素的遮蔽,致使后者未能受到学界充分的注意,这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研究来说无疑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本文若能在具体的问题之外,引起学界对这一现象的关注与兴趣,则又大幸矣!

注释[Notes]

① “托意写诚”是严复创造的翻译语,不见于此前的任何典籍,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近时论文之失》借用了这一词语,可知周氏兄弟的观点受到了严译《美术通论》的直接影响。

② 参见顾颉刚《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歌谣》第39号,1923年12月30日。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陈其泰《清代公羊学》(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Chen, Qitai. *Gongyang Studies in the Qing Dynasty (Revised Editio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1.]

丁文江 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Ding, Wenjiang, and Zhao Fengtian, eds. *A Chronicle of Liang Qichao*.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3.]

付建舟 胡全章《文学的双重变革——清末民初文学史》。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0年。

[Fu, Jianzhou, and Hu Quanzhang. *The Dual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ture: 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Hangzhou: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2020.]

傅斯年《中国文学史分期之研究》,《新潮》1.2(1919): 323—328。

[Fu, Sinian. "A Study of the Periodiz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New Tide* 1.2(1919): 323—328.]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Gong, Zizhen. *The Complete Works of Gong Zizhen*. Ed. Wang Peizheng.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2.]

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Gu, Jiegang. *Gu Jiegang's Collected Essays on Ancient History*. Vol. 1.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1.]

——:《诗经的厄运与幸运》,《小说月报》14.3(1923): 1—8。

[———. "The Misfortune and Fortune of *The Book of Songs*." *Novel Monthly* 14.3(1923): 1—8.]

贺昌盛《晚清民初“文学”学科的学术谱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He, Changsheng. *The Academic Lineage of the "Literature" Disciplin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2.]

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

[Hu, Shi, eds. *Compendium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Constructions of Theories*. Shanghai: The Young Companion Books, 1935.]

——:《胡适全集》第1卷,季羨林主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

[———. *The Complete Works of Hu Shi*. Vol.1. Ed. Ji Xianlin. Hefei: Anhui Education Press, 2013.]

——:《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姜义华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 *Academic Anthology of Hu Shi: The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Ed. Jiang Yihua.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8.]

黄侃《新方言后序二》,《章太炎全集·新方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Huang, Kan. "Epilogue to *New Dialects*."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ang Taiyan: New Dialect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4.]

黄遵宪《黄遵宪全集》下册,陈铮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Huang, Zunxian. *The Complete Works of Huang Zunxian*. Vol. 2. Ed. Chen Zhe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5.]

康有为《康有为全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Kang, Youwei. *The Complete Works of Kang Youwei*. Eds. Jiang Yihua and Zhang Ronghua. Beijing: China Renmin

- University Press, 2007.]
- 梁启超《饮冰·任公》:《沈氏音书序》,《时务报》4(1896)。
- [Liang, Qichao. "Preface to *Shen Xue's Phonetic Book*." *Journal of Current Affairs* 4(1896).]
- :《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订。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holarship in the Qing Dynasty*. Ed. Zhu Weizhe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6.]
- :《梁启超全集》,汤志钧、汤仁泽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
- [——. *The Complete Works of Liang Qichao*. Eds. Tang Zhijun and Tang Renze.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8.]
- :《汗漫录》,《清议报》35(1900):1—5。
- [——. "A Record of Travelling." *The China Discussion* 35(1900):1—5.]
-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1902):1—8。
-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ction and Social Governance." *New Fiction* 1(1902):1—8.]
- :《小说丛话》,《新小说》7(1903):1—12。
- [——. "Comments on Fiction." *New Fiction* 7(1903):1—12.]
- :《国国语原解》。上海:新民社,1907年。
- [——. *An Explanation of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anguage*. Shanghai: New Citizen Society, 1907.]
- 廖平《廖平全集》,舒大刚、杨世文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Liao, Ping. *The Complete Works of Liao Ping*. Eds. Shu Dagang and Yang Shiwen.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5.]
- 刘光汉(刘师培):《文章源始》,《国粹学报》1.1(1905):1—5。
- [Liu, Shiwei. "The Origin of Articles." *Journal of Chinese Classical Sciences* 1.1(1905):1—5.]
- :《广阮氏文言说》,《中国学报》(复刊)4(1916):1。
- [——. "An Expansion of Ruan Yuan's Theory of Classical Chinese." *Journal of China (Resumption)* 4(1916):1.]
- :《论文杂记》,《国粹学报》1.1(1905):5—7。
- [——. "Miscellaneous Notes on Stylistics." *Journal of Chinese Classical Sciences* 1.1(1905):5—7.]
- 鲁迅(令飞):《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 [Lu Xu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Vol. 6.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5.]
- :《摩罗诗力说》,《河南》2(1907):70—90。
- [——. "On the Power of Mara Poetry." *South of the River* 2(1907):70—90.]
- 彭春凌《儒学转型与文化新命——以康有为、章太炎为中心(1898—192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Peng, Chunl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the New Destiny of Culture: Centered on Kang Youwei and Zhang Taiyan (1898—1927)*.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 皮锡瑞《经学通论》,吴仰湘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
- [Pi, Xirui. *General Survey of Confucian Classics*. Ed. Wu Yangxia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7.]
- 钱穆《中国文学论丛·再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 [Qian, Mu. "Preface." *On Chinese Literatur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 钱玄同(疑古玄同):《钱玄同文集》第4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 [Qian, Xuntong. *Collected Essays of Qian Xuanton*. Vol. 4.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1999.]
- :《废话》,《语丝》54(1925):131—138。
- [——. "Nonsense." *Threads of Words* 54(1925):131—138.]
- :《致陈独秀》,《新青年》3.1(1917):1—7。
- [——. "A Letter to Chen Duxiu." *New Youth* 3.1(1917):1—7.]
- 袁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国官音白话报》19、20(1898):1—4。
- [Qiu, Tingliang. "Vernacular Language Is the Foundation for Reform." *Chinese Mandarin Vernacular Newspaper* 19/20(1898):1—4.]
- 倭斯弗《美术通论·文辞》,严复译,《寰球中国学生报》4(1907):1—8。
- [Worsfold, W. Basil. "Judgment in Literature: Literature." Trans. Yan Fu. *The Global Journal of Chinese Students* 4(1907):1—8.]
- :《美术通论·古代鉴别》,严复译,《寰球中国学生报》5、6(1907):1—10。
- [——. "Judgment in Literature: Criticism in the Ancient World." Trans. Yan Fu. *The Global Journal of Chinese Students* 5/6(1907):1—10.]
- Worsfold, W. Basil. *Judgment in Literature*. Edinburgh: Turnbull and Spears Press, 1901.
- 许慎《说文解字》,徐铉校定。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 [Xu, Shen. *Explanations of Characters Simple and Complex*. Ed. Xu Xuan.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1.]
- :《说文解字注》,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1 年。
- [---. *Annotated Explanations of Characters Simple and Complex*. Ed. Duan Yucai.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1.]
-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
- [Xu, Shoushang. *Impressions on My Late Friend Lu Xu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1.]
- 徐中玉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一》。上海: 上海书店, 1994 年。
- [Xu, Zhongyu, ed. *A Corpu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Literature Theory*. Vol.1.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1994.]
- 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
- [Yan, Jiayan, ed. *A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Vol. 1.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10.]
- 张凯《经今古文之争与近代学术嬗变》。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 [Zhang, Kai. *The Debate between Modern Text and Ancient Text Confucian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cademic Learning*.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20.]
- 章太炎(章氏学、章绛、太炎):《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册, 马勇整理。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
- [Zhang, Taiyan.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ang Taiyan: Letters*. Vol. 1. Ed. Ma Yo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7.]
- :《章太炎全集·〈诂书〉初刻本、〈诂书〉重订本、检论》朱维铮点校。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
- [---.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ang Taiyan (Words on National Salvation)*. Ed. Zhu Weizhe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4.]
- :《文学说例》,《新民丛报》5(1902):75—80。
- [---.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New Citizen Miscellany* 5(1902):75-80.]
- :《文学说例》,《新民丛报》15(1902):49—60。
- [---.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New Citizen Miscellany* 15(1902):49-60.]
- :《文学论略》,《国粹学报》2.9(1906):4—7。
- [---. "Brief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Journal of Chinese Classical Sciences* 2.9(1906):4-7.]
- :《文学论略》,《国粹学报》2.10(1906):1—5。
- [---. "Brief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Journal of Chinese Classical Sciences* 2.10(1906):1-5.]
- :《文学论略》,《国粹学报》2.11(1906):1—4。
- [---. "Brief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Journal of Chinese Classical Sciences* 2.11(1906):1-4.]
- :《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
- [---.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ang Taiyan (Preliminary Collection of Zhang Taiyan's Work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4.]
- :《汉字统一会之荒陋》,《民报》17(1907):103—108。
- [---. "The Crudit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Unification Association." *Minbao* 17(1907):103-108.]
- 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11 卷。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 [Zhong, Shuhe, ed. *The Complete Prose of Zhou Zuoren*. Vol. 11.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9.]

(责任编辑: 程华平)